

# 温病方证与 杂病辨治

张文选◎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 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

张文选 编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张文选编著.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117-08817-6

I. 温… II. 张… III. ①温病—经方②内科杂病—辨证  
论治 IV. R25 R28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88147 号

## 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

编 著: 张文选

出版发行: 人民卫生出版社 (中继线 010-67616688)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群园 3 区 3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http://www.pmph.com>

E - mail: [pmph@pmph.com](mailto:pmph@pmph.com)

购书热线: 010-67605754 010-65264830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125

字 数: 54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117-08817-6/R·8818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打击盗版举报电话: 010-87613394

(凡属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销售部联系退换)

# 阐发温病的方证理论 推广辨方证论治体系 开掘温病方治疗杂病 弘扬先师的用方经验

——写在前面的话

随着免疫学的深入发展，对人类生命危害最大的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现今临床上类似于明清时代的温病也越来越少见，因此，温病学的“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的变化，当前临床上，内生火热、内生湿热、内生寒湿病证日益增多。

内生火热、湿热、寒湿病与外感温病有基本相同的病机，用温病方治疗这类病证能够取得理想的疗效。

为了探讨如何适应温病临床的重要变化，我曾经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发表《论温病学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论温病学理法辨治杂病》（1996年第5期、1997年第6期），提出了温病学必须面对现实，调整方向，注重温病方治疗内生火热、湿热、寒湿等杂病的研究问题。

约10年以后，我对中医临床有了新的感悟，这就是：《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是中医的核心；其核心中的核心是这些经典中蕴涵的方证理论与辨方证论治的方法；忽视温病方证理论与辨方证体系的研究是导致温病方治疗杂病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50年高校教学的重大失误是迷信现行“辨证论治”是“中医特色”之论，没有重视《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中的方证理论与辨方证论治体系的

阐发温病的方证理论  
推广辨方证论治体系

教学研究。有感于此，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2 期、第 6 期分别发表了《辨方证论治体系初探》、《再论温病方治疗杂病——兼论温病方证与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提出了温病方证与辨方证论治体系的概念、方法及其在治疗杂病中的应用以及“现行辨证论治”方法的局限性等问题。

此后，我开始总结我的老师们的有关经验，增加自己的临床时间，实践辨方证论治的方法，观察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疗效；并将辨方证的方法与温病方治疗杂病的体会讲授给学生，得到了多数学生的支持与鼓励。在此基础上，我开始撰写《温病方证与杂病辨治》。

本书旨在阐发温病的方证理论，阐扬辨方证论治的方法，旨在推进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

为了使读者能够抓住本书的要点，把握全书的基本思路，现对本书中涉及的有关问题作一总体的说明。

### （一）关于温病的方证

张仲景《伤寒论》创立了经方的方证理论，柯琴发现《伤寒论》中“仲景有桂枝证、柴胡证等辞”，由此悟出方证是《伤寒论》的核心，乃宗此义，以方证名篇，而以论次第之，著《伤寒论注》，阐发了《伤寒论》六经中的方证理论。徐大椿经三十年探求，悟出《伤寒论》“非仲景以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是不类经而类方”，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遂打破六经框架，突出方证，将《伤寒论》方总分为 12 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进而，将“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症，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伤寒类方·序》），著《伤寒类方》，专论仲景方证。陈念祖认为掌握《伤寒论》的方

证是学习应用经方乃至中医临床的人手功夫：“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明证，明明提出大眼目，读者弗悟矣”（《长沙方歌括·小引》）。为了使学医者能尽快掌握经方方证，他苦心撰著《长沙方歌括》与《伤寒真方歌括》，用歌括形式深入浅出地总结了仲景的方证。

吴瑭感叹温病学尚没有像《伤寒论》那样的方证对应、一条一辨的医书，因此，他痛下决心，“仿仲景《伤寒论》作法”，采集《临证指南医案》的处方脉证，结合个人心得，著《温病条辨》，制定温病辨治 238 法，208 方，从而创立了温病的方证理论。吴氏明确指出，此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温病条辨·凡例》）

《温病条辨》方与《伤寒论》方密切相关，其取之于仲景经方的思路有五个方面：一是直接移用经方，如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栀子豉汤。二是化裁经方，如从附子粳米汤化裁出加减附子粳米汤，从苓桂术甘汤化裁出苓姜术桂汤。三是变制经方，如从炙甘草汤变制出加减复脉汤、三甲复脉汤，从麦门冬汤变制出沙参麦冬汤、益胃汤，从乌梅丸变制出连梅汤、椒梅汤。四是改制经方：如从麻黄附子细辛汤改制出下焦青蒿鳖甲汤，从小柴胡汤改制出中焦青蒿鳖甲汤。五是仿制经方，如从麻黄汤仿制出银翘散，从桂枝汤仿制出桑菊饮。《温病条辨》的方证是在《伤寒论》经方方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经方方证同属于一个支脉，可谓一脉相承。

在充分吸取《伤寒论》经方方证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吴瑭总结了明清时代新制定的温病方证，如三仁汤方证、黄芩滑石汤方证、草果知母汤方证等，从而建立了《温病条辨》的方证体系，创新了仲景的方证内容，发展了经方的方证理论。

除叶桂、吴瑭之外，温病学尚有温疫学派学说、伏气温病学派学说、通俗伤寒学派学说等，他们在各自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了另一部分疗效卓著的温病方，为温病方证理论谱写了新的一页。这些方证与《温病条辨》的方证共同构成了温病的方证体系。

叶桂遵《黄帝内经》之意，发明了以方中主药的性味归纳治法，阐发方剂结构与方义的理论，如所谓辛凉轻剂、甘寒益胃、苦辛开泄、酸苦泄热等。吴瑭继承叶学，认为：“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温病条辨·凡例》）根据这一认识，《温病条辨》不仅仿《伤寒论》体例，条分缕析地阐发了温病的方与证，而且阐明了各方所寓的法，如银翘散为辛凉法、清营汤为咸寒苦甘法等，从而把方与证、方与法与证的对应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深刻的阐发，为温病的方证赋予了新的内容。

总之，温病的方证体系是指温病方与证相关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在《伤寒论》方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仲景经方方证理论一脉相承而又独树一帜。

仅研究《伤寒论》经方方证则不能明其发展之流，只研究温病方证则不能知其基础之源。建立温病的方证体系，从流溯源研究温病方证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方方证，是本书的宗旨之一。

## （二）关于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

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是一种基本的辨证方法，它只能确定疾病大体的浅深层次、病机阶段或脏腑部位；方证是疾病在各经各阶段的最具体的病变形式，基于方证理论的辨方证论治方法是一种高层次的终端性的辨证方法，它能够使辨证的

思维深入到方证与药证的层次。例如，通过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确定出某患者病变在中焦，在胃，在气分，是仍然无法指导施治用方的，只有进一步辨识方证，才能确定患者的临床表现是白虎汤证，还是增液承气汤证，或者是甘露消毒丹证，才能具体的遣方用药。再如，某患者有明显的发热、恶风，用常规辨证确定其为上焦、卫分证，仍然是粗浅的，仍不能指导用方，只有进一步地辨析其是银翘散证，还是桑菊饮证，是桑杏汤证，还是三仁汤证等，甚至要具体分析有没有银花证、薄荷证、白蔻证、石膏证、栀子证等药证，才能具体地处方用药。因此，辨方证是任何一种辨证方法也难以替代的特殊的辨证方法，是实施温病辨证的最具体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

辨方证论治强调以经典原著的原始方证为依据。要求医者必须熟读《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等经典的原文，掌握其中方与证相关的规律、方证效应的规律以及辨识方证的思路。例如五苓散证，《伤寒论》第71条、73条、74条、156条、386条不仅论述了五苓散的适应证，阐明了此方证与茯苓甘草汤证、泻心汤证、理中丸证的鉴别，而且阐发了五苓散方证的效应“多饮暖水，汗出愈”，即强调五苓散是汗剂，其效应是“汗出愈”。医者只有真正掌握了仲景原著五苓散方证理论，才能在临床上准确地应用此方。辨证论治则不同，它不一定强调熟读《伤寒论》原文，不一定要求按照《伤寒论》方证使用五苓散。同样是用五苓散，前者着眼于“小便不利、口渴、烦、脉浮”等五苓散证，既可将之用于水肿，更可以将之用于腹泻、呕吐、眩晕、心下痞、郁证、霍乱、癰眩等病症，而且，在方证效应方面，着眼于“汗出愈”；后者则将之作为利尿剂，主要用于水肿，多从辨水肿的水湿内停证为着眼点使用该方。再如，三甲复脉汤证，《温病条辨·下焦篇》第

14 条论其证为：“脉细促，心中愴愴大动，甚则心中痛者。”吴瑭强调说：“甚则痛者，‘阴维为病主心痛’，此证热久伤阴，八脉隶于肝肾，肝肾虚而累及阴维故心痛……故以镇肾气补任脉通阴维之龟板止心痛，合入肝搜邪之二甲，相济成功也。”《温病条辨·解产难》并用其治疗妇人产后郁冒、痉、大便难、心虚、虚热等。如遵循辨方证的原则用方，就可从血肉有情之品通补奇经的理论出发，用三甲复脉汤治疗心动悸、真心痛，以及妇人产后诸病；如果按照辨证论治的方法使用三甲复脉汤，就只能用其治疗肝肾阴虚动风证。因此，辨方证论治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托，有前人已经建立的规范可遵循，它充分吸取了古人的经验，是借助前人的经验而用方治病；辨证论治则是根据中药学、方剂学的一般理论用方治病。两种体系辨证用方的思路截然不同，其起点与要求有高低之别，成功与获效的几率更有大小之异。

辨证论治方法着重强调的是“证”。何为“证”？现行《中医基础理论》的概念为：“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关于辨证，通行的认识是：“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可见，“证”不是症状和体征本身，而是由“辨”得到的抽象的概念，是医生主观思维活动的结果，因此，证的可靠性则完全是由医生的辨证水平所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对同一个患者如果同时由两个医生进行辨证时，所得出的“证”的结论往往不同，甚至会截然相反。这就说明，“证”不是客观的，“证”不一定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

辨方证论治体系着重强调的是“方证”。方证的“证”是指方的适应证。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在“方证相对论”一

文中指出：“方与证，乃是《伤寒论》的核心。”证，“简而言之，凡人之疾病，反映体之内上下，以及各种痛痒，各种异常现象，一些蛛丝马迹，都可以称之为证，证，就是‘证明’，客观存在，而领事物之先”。（《刘渡舟医学全集》）“干呕吐涎沫头痛”，是吴茱萸汤证，“黄疸脉沉，中痞恶心，便结溺赤”，是杏仁石膏汤证。方证的“证”字所包含的本质性含义就是疾病的症状与体征。由于症状与体征是疾病最客观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因此，“方证”能够反映疾病的本质。此以桂枝汤证为例试作说明，《伤寒论》桂枝汤证为：“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等，如桂枝汤证兼见“项背强几几”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葛根汤于桂枝汤加葛根四两，性味辛凉之葛根占据了主导地位，该方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桂枝汤证出现“腹满时痛者”，就变成了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芍药汤将桂枝汤中芍药量由三两增加为六两，芍药的量变使桂枝汤的作用发生了质变，芍药配甘草酸甘缓急止痛变成了主要作用，而桂枝只起温通经络的辅助作用；如桂枝汤证见汗出“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利，四肢微急”者，就成了桂枝加附子汤证，桂枝加附子汤于桂枝汤中加炮附子一枚，其方则由调和营卫的解表剂一变而成为温经补阳、固表止汗的附子剂。可见，症状变化，甚至一“症”之变，疾病的本质就可能发生变化；与症相应，一药之变，桂枝汤的作用也随之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就说明，能够反映疾病本质的是一个具体的症状与体征，是“方证”而不是“证”。“项背强几几”、“腹满时痛”、“汗出遂漏不止、恶风”等方证是无论哪个医生也能诊察得到的临床事实，因此，辨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本质，能够具体地揭示病机的细微变化，能够避免医者的主观臆测，减少主观失误，提高临床辨

证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虽然辨方证也存在医生的主观判断，但是，医者可以把桂枝加葛根汤证、桂枝加芍药汤证、桂枝加附子汤证等既有方证设为对照证，比较对照而辨之。与不设参比对照的辨证论治方法相比，其科学性与可靠性要高得多。

辨方证贵在“识机”。刘渡舟先生在阐明“方证”的概念后进而指出：“证之微妙之处，则在于‘机’。何谓机，事物初露苗头的先兆，也叫机先。《辨奸论》则叫‘见微知著’。”（《刘渡舟医学全集》），可见，辨方证贵在抓疾病本质初露端倪的细微症状以辨识“机先”，可以“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的确定方证的诊断。非主诉的不起眼的个别症状往往是疾病本质的反应，是“机先”外露的“马脚”，是“方证”的“微妙之处”，辨方证的更高一级要求在于见微知著，在于借助古人已有方证的“镜子”，透过细小的特征性表现抓住疾病的本质。例如，剧烈的偏头痛，只要见有恶心欲吐者，就可辨为吴茱萸汤证，就可以用吴茱萸汤治疗，无须辨头痛的经络部位，不必辨头痛的寒热虚实，用之辄效。再如，难治的咳喘，只要见有舌红苔厚腻一症，就可辨为甘露消毒丹证，就可以用甘露消毒丹治疗，不必考虑是温病还是杂病。因此，辨方证能够根据主诉主症以外的特殊“症”来抓方证，能够抓住疾病的特殊矛盾而重点出击，专方专治；能够根据个别、微妙的“症”预知“机先”，测识“病机”的隐匿之处而施以出奇制胜的治疗。

辨方证的方是前人久经使用而历验不爽的效方，法度严谨，疗效可以重复；辨证论治的方是医者自己组方，没有严格的要求，比较松散，加减变化随意，疗效难以重复。

经方临床家胡希恕先生在《经方传真》中提出：《伤寒论》有桂枝证、柴胡证，是以方名证的范例；“辨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是辨证的尖端”。刘渡舟先生提出：“《伤寒

论》既有辨证论治的学问，也有辨证知机的奥妙。两个层次，则有高下之分，精粗之别。”（《刘渡舟医学全集》）所谓“辨证知机”，就是辨方证的方法。

总之，辨温病方证论治体系是指以温病方证理论为基础的辨证方法，该方法强调从患者错综复杂的临床症状中，见微知著地抓住与某一方证特征性表现相一致的关键脉症以确定方证的诊断，并据方证而用方。辨温病的方证与《伤寒论》辨经方方证的方法完全相同，是一种高层次的特殊的辨治方法。

### （三）关于温病方治疗杂病

叶桂是经方的实践家，《温病条辨》方源于叶氏经验而根基于《伤寒论》，与伤寒方具有相同的属性，具有“经典方”的特征。《伤寒论》经方能够治疗杂病，《温病条辨》方也必然能够治疗杂病。

前人论伤寒方治杂病，以及广泛运用伤寒方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关键在于打破温病方对应的治疗温病这一习惯性思维，只要突破了这一惯性思维的束缚，就能进入“同方异治”的广阔的领域。

温病方之所以能够治疗杂病，是因为温病方是以方证的形式存在的。虽然时代不同，疾病有变异、绝灭、新生等变化，但是，疾病最基本的病理反应如发热、口渴、汗出、头痛、舌苔厚腻等症状是不变的，因此，方证的存在不随疾病种类或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仲景时代有白虎汤证，吴塘时代有白虎汤证，今天或将来的临床上仍然会有白虎汤证。同理，伤寒病过程会出现白虎汤证，温病过程会出现白虎汤证，杂病中也会出现白虎汤证。再如，翘荷汤证，《温病条辨·上焦篇》秋燥第57条载：“燥气化火，清窍不利，翘荷汤主之。”吴塘自注云：“清窍不利，如耳鸣目赤，龈胀咽痛之类。”掌握了这一方

证，临床上根本用不着考虑是否是秋燥，只要见到郁火上升的翘荷汤证，如咽痛、龈肿、目赤、耳鸣等，即可用之。辨方证论治的特点是无须考虑疾病种类与时间空间而据方证用方，这是温病方能够用于治疗杂病的基础之一。

温病方能够治疗杂病的另一基础是由外感病与杂病的复杂关系决定的。临床事实表明，外感病与杂病很难截然分开，一是外感病可以转变为杂病；二是杂病过程可以复感外邪；三是不少杂病早期多以外感病的形式出现；四是部分疾病究竟是外感病还是杂病的确难于断然区分。注重临床的张仲景没回避这一临床事实，除《金匱要略》部分论杂病外，在专论伤寒病的《伤寒论》部分也阐发了杂病的论治。陈亦人《伤寒论求是》认为太阴病从“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及“自利不渴”等证来看，就是杂病。吴塘深刻认识到外感温病与杂病的复杂关系，在《温病条辨·凡例》中指出：“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在下焦篇湿温第62条减味乌梅丸后自注说：“本论原为温暑而设，附录数条于湿温门中者，以见疟痢之原起于暑湿，俾学者识得源头，使杂症有所统属，粗具规模而已。”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温病条辨》上、中、下焦篇中均论述了疟、痢、疸、痹、疰等杂病的方证。另外，《温病条辨》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寒湿的证治，所述寒湿方证多数是外感与杂病兼感之证。吴氏在《温病条辨·下焦篇》寒湿第42条自注中强调：寒湿、湿温，“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在上焦也，如伤寒；其在下焦也，如内伤；其中焦也，或如外感，或如内伤。至人之受病也，亦有外感，亦有内伤，使学者心摇目眩，无从捉摸。其变证也……倍而又倍。”吴氏精辟地阐发了外感温病与杂病的内在联系，制定了一系列

既能治温病又能治杂病的方剂。因此，温病方本来就既能治外感病，又能治杂病，具有双向性作用。现今临床常见疾病更加复杂，许多疾病如免疫性疾病就难以截然分清楚是外感病还是杂病，温病方在这类疾病的治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温病方能够治疗杂病的再一基础是现今临床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内生火热病、内生湿热病、内生寒湿病。内生火热、湿热、寒湿病邪郁伏于体内，可以外发于卫表，蕴郁于气分，可以深入营分，郁结血分，可以损津伤阴，耗气伤阳，可以影响三焦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具有与外感温病类同或相同的病机，辨治这类疾病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温病的理法，卫气营血理论、三焦理论，特别是温病的方证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这类疾病的病机，温病方是治疗这类疾病的有效方剂。

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可以开拓杂病临床辨治的思路。杂病用杂病方人人皆知，杂病用温病方却知者较少，倡导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能够拓展内、外、妇、儿等学科临床用方的思路。例如，《温病条辨》清宫汤，主治“神昏谵语”，此方以其清心凉营开窍的作用，可以治疗癫痫、精神分裂症、强迫症、抑郁症等精神性疾病，从而为内科学辨治这类疾病开拓了新的思路。其二，有利于将温病的研究引向深入。目前临床上已经难以见到仲景时代、明清时代出现的典型的温病，因此，如果墨守温病方治疗温病的研究，温病学将会逐渐萎缩甚至被淘汰。若转换研究方向，注重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不仅具有广阔的前景，而且可为中医的现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例如，《温病条辨》安宫牛黄丸的开发研究，不仅研制出了新的制剂清开灵，而且，以之治疗中风的临床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 (四) 关于师承与治学

经验丰富、疗效显著的大师级的中医多是熟练掌握方证理论与辨方证方法的临床家，换句话说，擅长于运用经方、温病方的名医在临床中多善用辨方证的方法，如刘渡舟先生善用苓桂术甘汤治疗各种杂病，他根据仲景所论述的脉证，将苓桂术甘汤的证概括为：水舌：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水脉：沉弦或沉紧；水色：面黧黑或见水斑；水气上冲症：心悸或动悸、胸满、眩晕等。临床上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这些特征性表现，就径投苓桂术甘汤，每可取捷效。赵绍琴先生对升降散有深刻的研究，以之治疗火郁证。他把升降散的证概括为：舌红起刺，脉弦滑细数，心烦急躁，自觉心中愤愤然，莫名所苦等。临床上只要见有升降散证，不论是什么疑难杂病，就率先投以升降散，亦可每起沉疴，分析他们的临床思路，可以看出其最基本的方法有三步：首先，把某一有效方的适应证特别是特征性表现把握清楚，如苓桂术甘汤的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等；升降散之心烦急躁、舌红起刺等；其次，把某方与其适应证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方证”，如苓桂术甘汤证、升降散证；其三，临床上不管是什么病，不管患者的表现多么错综复杂，只要能发现某一方证的特征性表现，就紧紧抓住这一特征性表现，确定为某“方证”，径投该方予以治疗。这一临床思路就是本书所谓的“辨方证论治”的方法。因此，要想掌握辨方证的方法，仅仅限于熟记《伤寒论》、《温病条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拜师临证，学习名师自己总结的辨识方证的心法。

我学医以来最有幸的是遇到了四位既善用经方又精通温病方的德高望重的名师：一位是陕西中医学院教授王正宇先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幸拜其为师学习中医，王正宇先生有大

学文科的基础，有广博的文史哲学知识，严谨的思维逻辑，很高的研究素养。他从事中医教学与研究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方剂的理解，他创造性地应用划分方剂内部结构的方法解释方理，这种方法对我研究方与证的对应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临床上，先生擅长用仲景经方与叶氏方，处方严谨，疗效显著。我先后随诊5年，打下了研究方证、应用成方治疗现代病的基础。先生虽然对叶桂、吴塘的方证手法有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他的老师多数是伤寒经方家，受其影响，临证多凭借老师的经验用经方者多而用温病方者少，因此，他指导我先读《温热论》与《温病条辨》，后读《伤寒论》，以期弥补北方医生不熟悉温病方应用之不足。

王正宇先生的体会是正确的，在北方很难找到对叶桂、吴塘温病方有深入研究且具有应用经验的名师，因此，当全国第一届温病学博士生招生的机会来到之后，我下决心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教授的博士，有幸成为他的第一届博士生，随先生学习中医3年。孟老师对叶桂的手法与吴塘《温病条辨》有深入的研究，临床善用叶氏方或吴塘方治疗疑难杂病，并擅长据证取古方数法合而为方。处方有叶派风格，轻灵而严谨。先生曾对我说，他当年跟师学习时，若逢老师外出，家里就由他代替其师接诊，当遇到疑难病难以应对时，就翻《温病条辨》与赵海仙《寿石轩医案》，足见他在温病方临床应用上所下的工夫。受其影响，我对温病方的临床应用研究有了浓厚的兴趣，也从此奠定了临床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较为扎实的功底。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任教，名医赵绍琴先生作为终生教授在温病教研室执教。赵绍琴先生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在清太医院供职为御医。其父文

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吏，御赐头品顶戴花翎。受其父影响，赵老临床治病有突出的特点：一是有御医风范，处方药味少，分量轻，善以轻灵纤巧取胜；二是善于用家传师授的古方变通法为方治病；三是擅长用温病法治疗大病难症。其处方轻描淡写，却能有传神的疗效。我曾经利用在同一教研室的便利机会跟随赵老临床学医，感悟到了赵老变通古方为新法的临床思路，由此打下了变化古方、温病方治疗杂病的基础。

此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老师答应我的请求，接受我和我的夫人王建红医师跟随他临床抄方学医。刘渡舟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经方临床家，临证用方有经方派的特点与风范，不仅善用经方原方，而且运用温病方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先生的用方风格与疗效使我对中医临床有了一次大彻大悟，这次感悟也使我的中医临床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从此以后，我一边跟刘老上临床，一边重读《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以及刘老的著作，并且追寻与刘渡舟先生学术交往较多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伤寒学家胡希恕先生与陈慎吾先生生前的著作、讲稿、录音，进行反复学习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找到了撰写此书的灵感。

在我着手撰写本书的时候，四位老师已先后谢世，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与感激之情，我称他们为“先师”，在书中每方的“用治杂病举例与体会”中，我首先对他们应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经验以及相关的理论进行了研究、整理、总结、介绍，希望他们的珍贵经验能够通过此书而发扬光大。

### （五）关于本书的宗旨

第一，阐发温病的方证理论：由于吴塘过分强调温病的三焦理论，追求与《伤寒论》六经的“一纵一横”之妙，因此，